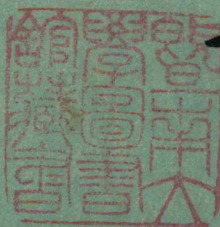


309466

陳垣校長誕生百年

紀念文集



北京师范大学



学生室

中文书库



陈垣同志 (1880 — 1971)



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一年亲切接见陈垣同志



陈垣同志和郭沫若同志、老舍同志亲切会面



陈垣同志在励耘书屋



一九五九年陈垣同志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，
这是他和支部同志在一起

百花過盡綠陰成
漢煙香睡晚晴
病起兼旬疎把酒
山深四月始聞鶯
近傳下詔通官路
已卜餘年見太平
聖主不忘初政美
小儒惟有涕縱橫

戊子清明後下詔省勾書付

通餘

新會陳垣

雪晴斜日浸蒼苔
梅影一枝窓上來
通餘吾弟晒存

戊子小陰

陳垣

陈垣同志墨迹

前 言

今年十一月十二日是北京师范大学前校长陈垣同志诞生一百周年。为了纪念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、教育家，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，并重印他的著述专刻《励耘书屋丛刻》，编辑出版《陈垣校长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文集》和《陈垣校长诞生一百周年纪念论文集》。

陈校长早年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活动，后来专门从事史学研究和教育工作，数十年中，勤谨治学，坚持不懈，把毕生的精力和才能贡献给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，不愧为多有建树、受人尊敬的老学者。他一生热爱祖国，晚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成为知识分子勇于进取的好榜样。现当全国为实现社会主义四化、繁荣文化科学事业而奋斗的时期，他的这种奋勉精神更是值得学习的。

这次我们编印纪念文集和纪念论文集，承蒙陈垣校长生前友好惠撰鸿文，我们在此，谨致谢忱。编排中的粗疏遗漏处，切望读者指正。

编 者

一九八〇年十一月

K107
803

309466

陈垣校长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文集

目 录

前 言

纪念陈垣校长诞辰一百周年.....	纪念陈垣校长百年诞辰筹委会 (1)
回忆陈援庵先生四事	
——致刘乃和同志书	郑天挺 (12)
回忆陈援庵师	单士元 (14)
陈垣同志的学术贡献.....	蔡尚思 (18)
励耘书屋问学回忆	
——陈援庵先生诞生百年纪念感言	牟润孙 (29)
疾风知劲节, 小草沐春晖	
——回忆陈垣先生二三事	李 瑚 (33)
励耘书屋问学札记	史树青 (46)
欣然敬父执, 化雨浴春风	
——纪念陈援庵先生诞生一百周年	李希泌 (50)
陈援庵先生遗札跋	柳曾符 (54)
回忆我的老师援庵先生	赵光贤 (57)
夫子循循然善诱人	
——陈垣先生诞生百年纪念	启 功 (62)
援庵先生治史的方向	郭预衡 (74)
“书屋而今号励耘”	
——学习陈援庵老师的治学精神.....	刘乃和 (80)
诗四首	王仲萃 (93)
南乡子 (词一首)	
——纪念陈援庵师百年诞辰.....	李 瑚 (13)
陈垣同志已刊论著目录系年	刘乃和 (94)



纪念陈垣校长诞辰一百周年

纪念陈垣校长百年诞辰筹委会

今年是陈垣同志诞辰一百周年，我们怀着无限怀念的心情和深深的敬意，纪念我们敬爱的老校长！他是我国卓越的历史学家，也是著名的教育家，他把毕生精力献给教育事业和史学研究，为祖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材，并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史学著作，他在道德品质和勤奋治学等很多方面都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！

陈垣同志（一八八〇—一九七一），字援庵，广东新会人。他在青少年时候，就痛感清廷的腐败和民族灾难的深重，努力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，积极投身于推翻清朝统治、建立共和的斗争行列。一九〇四年，他和朋友创办《时事画报》，一九一一年创办《震旦日报》，并主编该报副刊《鸡鸣录》，撰文抨击清朝政府，宣传鼓动反清思想，激发群众革命感情。并经常与农工商会同入上街演讲、宣传。

一九〇五年，在全国掀起的反美拒约运动中，以美国泰大臣和总统女公子为首的代表团，到广州了解反美情况。农工商会针对当时形势，组织了街头宣传，抵制美货，《时事画报》编辑反美专号，反对代表团到广州。

这时期，他认为要使国家富强，必需摆脱贫困落后状态，应当提高文化，提倡科学。在他办报期间，除写时论文章外，还积极撰写宣传创办学校、医药卫生等方面的文章，如提倡兴办女学、宣传西法接生等等。

一九〇七年，他考入美国教会办的博济医学院学习，看到学院里美国教师对中国师生非常歧视，他很气愤，和朋友商议，在各方集资，创办了光华医学院，他自己也从博济转到光华继续学习。所以他不但这座中国人自己办的医学院创办人之一，也是该校第一届毕业生。毕业后留校作助教，讲授人体解剖学、细菌学和生物学等课。

在医学院学习和工作期间，除兼办《震旦日报》，经常写稿外，并在《卫生报》和《光华医事卫生杂志》上撰写普及医学知识和医学史的文章。

他写的时论文章，简练明快，笔锋锐利，评论时政，反对专制，对推翻清政府起了宣传促进作用，后来有人写辛亥革命史时，称他为“革命报人”。

辛亥革命后，来到北京，开始钻研文史。这时帝制虽推翻，但革命果实被反动军阀篡夺，他曾一度在教育部任职，抱教育救国幻想。但眼见国家依然孱弱混乱，百姓仍然颠连困苦，他思想上感到迷惘、苦恼。便毅然辞去教育部职务。从一九二二年到北京大学讲课，先后在北京各大学任教，直到北京解放。

一、辛勤培育、桃李满园

陈垣同志十八岁已开始在广州教学馆，后来在办报期间，因躲避清政府搜捕，自广州回到家乡新会篁庄小学教书，往返于广州、新会之间。一九〇七年转到广州振德中学教书。他一面教授文化知识，一面传播推翻清廷的革命思想，受到同学的欢迎，却遭到该校校长的疑忌。

在医学院任教期间，讲课注意直观教学，那时还没有挂图，都是他自己画图，使学生从感性认识进入理性认识，讲解了理论，又看到实际，以加深印象。这期间，他也间或为群众诊病，积累的实践经验，运用在课堂教学上，同学都认为他讲课有新思想、新内容，容易理解，对他的课非常欢迎。

一九一三年来到北京。一九二〇年，华北大旱，遍地灾黎，他和朋友筹办“北京孤儿工读园”，次年二月开学，收容河北孤儿二百余人，半工半读，使无家可归的孤儿得到安置。这年九月又创办平民中学，除招收一部分小学毕业生外，并大量招收河北灾区青年就学。他在该校任校长，兼教文史课程。

一九二一年十月任教育部次长。当时正是军阀混战时期，各大学院校数月发不出工资，院校教师代表纷纷到教育部索薪请愿。他极力主张国家应首先设法拨款发给各校教师“欠薪”，在他大力呼吁、斡旋之下，补发了部分“欠薪”，解决了院校教职工的暂时困难。

次年，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，辞去教育部职务。后在北京大学、北平师范大学、辅仁大学、燕京大学等校任教。从一九二六年开始任辅仁大学校长。并先后任京师图书馆长、北平图书馆委员、故宫博物院理事兼故宫图书馆长，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、北平研究院特约研究员等职。

他从青年开始教学，到他逝世，从事教育工作达七十余年。

他在教学中，一直重视学生基础课的学习。他当时主张全校一年级学生，不论文科、理科，都应当学好国文（语文）课。“大一国文”课都是由他聘请学有根柢的教师担任，他自己也常常亲自教这门课程。

在历史系，他开始创设了“史学名著选读”和“史学名著评论”两门课程，作为学习历史专业的基础课，并每年自己为一二年级讲授这两个课。后来这两门课逐渐固定下来，至今成为历史系的必设课程。

他一贯重视课堂教学。他每年除去教必修课外，还时常开选修课。每年仍不断有论文专著出版，几十年来，他从来没有因撰写论文就停止讲授，也从来没有因开课多而停止写作。

当时讲课，都不要求教师作教学计划，有的教师就是漫无边际地随意讲授。但是他的课程，在每学年开始就自己订好教学计划，这门课一年中准备解决什么问题，每堂课都拟讲授什么内容，都有一定计划和要求。

他教学态度一贯严肃认真，对待课业一丝不苟，板书整齐清楚，刚劲秀丽。课堂讲授条清缕晰、深入浅出，学生易于理解，易于掌握，易于记忆。尤其值得提到的是，他教课不仅教给学生知识，而且注意培养学生独立工作能力。他曾创设过一门选修课“史源学实习”，办法是以一种史学名著为底本，一一追寻其史源，考订其讹误，以练习同学的读史能力。鼓励同学自己动手查书、找材料、作文章，每隔一星期作练习一次，课卷他总是仔细批改圈阅，从作业的内容到字句，从作法好坏到材料正误，无不在课卷上详细注明，课卷上有眉批、有总批，俾便同学得以遵循，经过这样的严格训练，同学进步提高很快，而且对读书、查书、考证、写作都发生了兴趣。

他备课认真、负责，凡准备留给同学的作业，无不亲自查对，事先作好准备。每留习作，总是自己先作一篇，同学交卷后，他把自己写的同样题目的文章印发或张贴，以为示范。有时和同学们互相品评，分析自己文章的所长所短。同学偶有意见，他都极为重视，同学所提如不对，当即为其指出致误之由，但每有可取，他无不虚心考虑，并对同学予以表扬。这样教学相长，不但引起同学对课程的兴趣，而且使同学逐渐得到做学问的门径。

他对他教过的每个同学，大体都能了解，往往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，学生又来看他时，他一般仍能叫出名字，甚至能够说出这位同学读书时成绩的优劣，文章作得好坏，书法写得如何。

有人以为他要求学生严格，认为和他不易接近，或者有畏难情绪，不敢选他的课。但真正和他读过书的人，都知道他对功课要求虽然严格，但对学学生，有如春风化雨，循循善诱，和蔼可亲，凡是听过他课的人，离开他后都时时想念他，也无不感谢他的谆谆教诲。

他是我们教育界的老前辈，是我们永远怀念的好校长、好老师，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他教书几十年，桃李遍天下，其中有许多优秀人材，为祖国作出有益的贡献。

解放后，他关心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，在祖国新的历史形势下，他更感到办好师范教育、培养教师工作的重要，他殷切地希望每年能有大批优秀青年，为党的事业的需要，投考高等师范，每年他都撰写文章热烈欢迎优秀青年投身到教育战线上来！

二、刻苦治学，著作等身

陈垣同志研究史学几十年，他的研究工作，范围广泛，内容深入。尤其对元史、中西交通史、宗教史，有专门研究，都有独到见解，作了大量的精辟的工作，对于年代学，以及目录、校勘、史讳、辑逸、工具书等方面，都有开创性的成就，对于《四库全书》、敦煌资料等也都做过深入细致的钻研。

他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，今概括分为三类：

1. 宗教史的研究：

他研究宗教史，不研究宗教教义，而是着重宗教的发展、变化、衰亡的历史，以及记载宗教的史籍；研究的范畴也不限于某一种宗教，而是涉及到很多种现存宗教和历史上的外来古教。他对道教和世界三大宗教——佛教、基督教、伊斯兰教都有专门著作。

一九一七年，他发表了史学研究的第一篇论文《元也里可温教考》，这是一部专用中国史料来考证元朝基督教情况的论文。发表后，得到史学界的极大重视。这年年底，他赴日本访书，应日本学术界之请，宣读这篇论文，受到日本史学界的惊叹和赞誉。

此后他继续发表了《开封一赐乐业教考》，内容写关于明朝以后犹太教在中国传布的情况；《火祆教入中国考》，叙述火祆教自南北朝时北魏、南梁从波斯传至中国，历隋唐至宋代从发展到衰微的历史；《摩尼教入中国考》，讲述摩尼教自唐代传至中国及在中国传布的情况。这四种专著，他自己总称之为“古教四考”。

关于基督教史的论文共发表三十余篇，主要有《基督教入华史略》、《元基督教之华学》、《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的天主教》、《吴渔山年谱》和他称为“天主教人物四传”的李之藻、王征、金声、许缙曾四人的传记等。

关于佛教史的研究，他不但对主要的佛教史籍作过详尽的介绍，对自晋至清初二千八百多僧人的生卒年作过详细考订，为研究佛教史的工作提供了方便，而且还利用前人从没有利用过的《嘉兴藏》里僧人语录作为考史资料，写出专门著作，为历史研究工作者打开了经藏资料的库藏。有关佛教史的论文主要有《〈大唐西域记〉撰人辩机》、《佛教能传布中国的原因》、《明季滇黔佛教考》、《清初僧诤记》等等。

关于伊斯兰教史，他写有《回回教入中国史略》，研究道教史的有《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》等等。

其他关于宗教史方面的论文还有很多。所有论文，都引用了大量、丰富

的资料，作出精辟的论断。有些论著填补了宗教史研究的空白，有的则提出创新见解，在我国宗教史研究上作出了出色的成绩。

2. 目录、年代、校勘、史讳和工具书的研究：

陈垣同志作学问，很注重目录学。解放后他多次和同学谈起做学问要熟习目录学的问题，他自己就是从目录学入手的。他说：“历史目录学就是历史书籍的介绍。懂得目录学就可大概知道祖遗仓库里有什么书，如果连仓库里存货情况都不了解，还谈什么继承、批判呢？”他就是因为在这方面打下坚实基础，对中国古代历史书籍了如指掌，所以后来他写专题论文时，总是广征博引，左右逢源，得心应手。因为对历史文献有较全面的调查研究，对研究的问题，才能得出较精确的结论。

他幼年在广州时，是在私塾读书，无非诵读四书五经之类。十三岁时，偶然在老师的书架上看到一本《书目答问》，翻阅后，立刻被这本书给吸引住。因为这本书目列了经史子集各部书籍，有著者、卷数、版本、简单内容等，他看后非常高兴，从此就根据这本目录有选择地读书、买书，大大开阔了历史文献的眼界。以后他又仔细研究了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，知识面更为增广。几十年后，他谈起中国浩如烟海的文史书籍时，仍能历历如数家珍。

他在北京，能有机会读到住在广州时想看而看不到的很多书籍，尤其和京师图书馆取得联系后，得以读到文津阁本《四库全书》。这是他初到北京时最高兴的事情，他每天到图书馆看《四库》，不间断地读了十年，把这部包括三千四百七十多种书籍，三万六千三百册的大丛书，全面加以分析、研究。他不但对《四库》的征书、编纂、抽毁等情况加以了解，而且编写了《文津阁书册数、页数表》，又编了《四库书目考异》，将书目的变化，有书无目，有目无书等详细论述。为了便于查找，还写成《四库撰人录》和《四库书名录》，以及《〈四库全书〉纂修始末》等等。

二十年代他为历史系创设的“史学名著评论”，就是为帮助历史系同学在目录学方面打基础的课程，凡是学过这门课的，都感到得益非浅。

他自己也编过不少目录学的书，如《明末清初教士译著现存目录》、《中国佛教史籍概论》等等，对研究基督教史和佛教史都有重要参考价值。

他对年代学的研究，是从研究外来古教、中西交通史和伊斯兰教史时开始的。因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时，遇到中、西、回历法上不同的困难。因回历不设闰月，经过三十二、三年就比中西历多一年，一百年就多三年，自唐初回历开始使用到现在，一千三百多年间，相差四十多年。中国历来记载有关涉及到回历的古籍中，凡讲到中回历对照时，大部都有错误，在中外史书的记载，同一事件常会差几十年，使研究者莫衷一是。中历朔闰，过去只有断代长历，各自为书，没有自古至今的通历。至于中西历对照、中西回历对

照，当时更没专书，难于查找。

陈垣同志决心为研究者铲除这个障碍，因此他用了四年的时间，著成《中西回史日历》、《二十史朔闰表》两书，从此中国有了中西回三历对照的年表。自此二书出版，半个多世纪以来，给史学工作者带来莫大便利，为研究中西交通、中外关系的历史，在纪年方面打开了一条通途。

和目录学有关的校勘学，也是他非常注意的问题。他曾说：“校勘是读史先务，日读误书而不知，未为善学也。”当然他也不是说每个读史者人人都要先做校勘工作，而是说应该重视这个工作，把这工作做好。陈垣同志在清代校勘学家研究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加以探讨、总结。他做校勘工作是从实践入手的，他曾用了很长时间校勘了一部《沈刻元典章》，用四种手抄本以及在故宫发现的元刻本与《沈刻元典章》校对。校出沈刻本的讹误、衍脱、颠倒之处共一万二千多条，写成《元典章校补》，然后又将校勘出的材料，选出一千多条，归纳、概括，按其致误的原因，总结出其中规律，提炼为四十二例，写成《元典章校补释例》，即《校勘学释例》，从而为校勘学作出一较全面的总结，使校勘工作者有所遵循、参考。

中国古籍中，常常会遇到历代君主的避讳问题，避讳时则用改字、空字或缺笔等办法改变古书，造成后世阅读时的困难。避讳自周开始，直到清末，中国二千多年间的史籍都会遇到这个问题。过去虽有人研究过，但都散见各书，或则片断零散，或则错误很多。

陈垣同志在一九二八年，将避讳问题分析研究，写成《史讳举例》一书，书中最后附历代讳例，极便检阅。这部书实际是给避讳作了一个总结。了解了避讳的规律，不但能把因避讳而淆乱的古文书得到解释，而且一经掌握，则可利用它解释古书疑难，辨别古书真伪，判断古书的时代，对于考证、校勘、版本，以及文物、考古等工作，都提供了很大方便。

工具书更是他所注意的问题，他经常提醒学生要善于利用已有的工具书，可以节省时间，事半功倍。他自己也十分注意编撰工具书。他过去在写某一专题时，总是自己动手把必要的工具书准备好，以备随时检用。《全上古三代秦汉魏晋南北朝文》、《全唐文》、《四库》、《清史稿》等书尚未有索引出版时，他都会自己作过索引。为了研究《元史》，他把《四库》中元人文集六十种的子目编撰为《元六十家文集目录》以备查找。已出版的除上面所说的关于年代的两种书外，还有查僧人生卒年的《释氏疑年录》，为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卷子编写的《敦煌劫余录》等书。

当时有些学者认为做这类工作只能算是资料工作，不是学术研究，不屑去做。他却认为工具书是利人利己的工作，不能轻视，他在《中西回史日历》序中说：“兹事甚细，智者不为，然不为终不能得其用。余之不惮烦，

亦期为考史之助云尔”。他就是不惮其烦地工作，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资料、索引和工具书，成为今天不可缺少的“考史之助”。由于有了他的辛勤劳动，才使我们后辈享用了成果，得到了方便。

总之，他不但重视精深的专题研究，而且重视历史学的基础知识，并且为我们后学掌握基本功创造了优异的条件，作出了重大的贡献。

3. 抗战期间的论著

陈垣同志是一位爱国史学家。他的爱国思想在很多论文中都有反映，尤其是抗战期间的著作，更为突出。

他自从辞去教育部职务后，便倾注全部精力于读书、教书、著书。北京沦陷后，他悲痛已极，敌伪的残酷统治，他非常愤慨。八年间，更是杜门谢客，不与外界来往。当时他的处境，异常困难，学校同事、同学连遭逮捕、迫害，他自己也是经常受到威胁。敌伪政府多次想利用他的声望，逼迫他出来作伪职，都遭到他严词拒绝。

当徐州陷落时，敌伪政府命令北平机关、学校都挂国旗“庆祝”，当时辅仁大学和辅仁附中都不挂旗，敌伪政府强令停课三天，并多次找校长“质问”，他说：“自己国土丧失，只感到悲痛，要我们庆祝，办不到！”最后敌伪派一个“学者”来劝他，说：“你不依命令难道不怕死吗？”他从容镇定地引用《孟子》的话回答这位“学者”说：“生亦我所欲也，义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生亦我所欲，所欲有甚于生者，故不为苟得也；死亦我所恶，所恶有甚于死者，故患有所不避也。”多少次敌人威胁他，甚至曾派日本宪兵来逮捕他，他的态度是一不屈服，二不示弱，始终是沉着应对，坚贞地渡过了艰苦的八年。

敌人也曾多次用高名厚利请他出来做事。有一次他们组织所谓“东亚文化协议会”，请他作副会长，说这是大东亚各国最高的文化机构，每月薪水几千元。他义正词严地说：“不用说几千元，就是几万元我也不干！”当他听说他们拟改请某人时，他和这人是老朋友，他得知这消息后连夜去找这位朋友，希望不要答应此事，到了这位朋友家，才知已经答应了，他听说后拂袖而去，从此再不和这位朋友往来。

他坚持民族气节，做到了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。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，维持着学校，学校坚持不挂日本国旗，不向日本国旗行礼，不用日文课本，他用大无畏的精神，冒着生命危险，为师生们解决了一次次危难，全校师生对他非常担心，也非常敬佩。

抗战期间，他撰写的论文有《明季滇黔佛教考》、《清初僧诤记》、《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》和《通鉴胡注表微》等。每部书里都贯串着他热爱祖国，怀念祖国，相信祖国必胜，揭露敌伪残暴，痛斥汉奸无耻等思想。

《明季滇黔佛教考》是一九三九年开始动笔。内容所写西南遗民避清逃禅的活动都是在清初，但书名用“明季”，以示这些遗民终未降清。滇黔是明桂王建立政权所在，也是当时抗战后方，所谓“明季中原沦陷，滇黔犹保冠带之俗”。这书从命题到内容，都反映他身处北平，怀念祖国的心意。

《清初僧诤记》写清初东南法门的纷争。讲法门中故国派和新朝派的矛盾，写的是佛教派系争执，实际是反映政治上不同趋向的斗争，也就是写投降派和抗战派的斗争。

《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》是讲南宋初年金人统治北方后，有些人为了反抗金人统治，先后创立全真、大道、太一三教，藉以团结训练，自谋生活，不仕金朝。因这三教不同于宋以前正一天师创立的道教旧派，所以名之为新道教，新道教当时在河北一带影响很大。

三教的教祖都生在北宋，创教则在金朝，但因他们都是不仕金朝的北方学者，书名不称金朝，而称南宋初者，“从其志也”。他在这书的《重印后记》里说：“芦沟桥变起，河北各地相继沦陷，作者亦备受迫害，有感于宋金及宋元时事，觉此所谓道家者皆抗节不仕之遗民，岂可以其道教而忽之也。”“诸人之所以值得表扬者，不仅消极方面有不仕敌之操，其积极方面复有济人利物之行。”表扬那些不投降、不仕敌的人，同时痛斥那些认贼作父，为虎作伥的汉奸走狗。

以上三种著作，他自己合称之为“宗教三书”。宗教三书，不论选材，还是文风，都和他抗战前的著作大有不同了，这三部书都是他的精心之作。

他的《通鉴胡注表微》更是沥血呕心的论著。这部书主要是写南宋末《通鉴注》作者胡三省爱国思想，以表达他自己的爱国热忱。

胡三省，字身之，生当我国历史上民族斗争非常激烈的时期，他出生前，中国北部已被金占领，还在幼年，元又灭金侵宋，以后他就在宋元长期战争的环境里长大，一直注释《通鉴》二十多年，到他七十三岁死去。胡三省曾亲眼看到宋朝的覆灭，元朝的残酷统治，在《通鉴注》中时发感慨，斥责卖国投降败类，申诉元朝残酷压榨，以及身受的亡国惨痛，字里行间时时流露出他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热情。但是这样一位爱国史学家，长期被埋没，从来没有人给他写过一篇传记。到清朝，虽有人提到过他，但也只认为他擅长地理和考据，并没有人真正认识他。

陈垣同志写《表微》时，正当敌人统治着北京，人民在极端黑暗中过活，汉奸更依阿苟容，助纣为虐。他说这时“精神异常痛苦，阅读胡注，体会了他当日的心情，慨叹彼此的遭遇，忍不住流泪，甚至痛哭。”因此决心为胡注写出“表微”，对胡三省的生平、处境、思想、意志，作了全面研究。

他所以能够深入了解胡三省，也就是因他当时在北京所处的环境与胡三

省颇相似，在读《通鉴注》时，看到“臣妾之辱，唯晋宋为然，呜呼痛哉”！又有“亡国之耻，言之者痛心，矧见之者乎！此程正叔所谓真知者也，天乎人乎！”他每读到这里，面对当时的现实，“不禁凄然泪下”！感情的接近，思想的相通，各自身受的苦难，使他得以写出这部热爱祖国、痛斥汉奸，激励人民爱国情感，宣传抗战必胜信心的巨著。

总之，他在抗战期间的著作，充分表达了他具有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。他虽然未能离开北平到后方，虽然未能直接参加抗日杀敌，但是他独处孤城，不妥协、不投降，保持民族气节，傲骨崢嶸，凜然大义，以自己的历史研究和课堂教学，在可能的条件下，尽了自己的力量。

综观他的学术研究，由于他青年时学习医学，经过严格的科学锻炼，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基础，这对他后来从事史学研究，起了很大作用。他的写作，实事求是，不尚空谈；治学态度，严肃认真，一丝不苟。

一九五〇年初，他曾给武汉大学一老朋友写信谈到他的治史思想说：“九一八以前，为同学讲嘉定钱氏之学；九一八以后，世变日亟，乃改顾氏《日知录》，注意事功，以为经世之学在是矣。北京沦陷后，北方士气萎靡，乃讲全谢山之学以振之。谢山排斥降人，激发故国思想。所有辑覆、佛考、谗记、道考、表微等，皆此时作品，以为报国之道止此矣。所著已刊者数十万言，言道、言僧、言史、言考据，皆托词，其实斥汉奸、斥日寇、责当政耳。解放以后，得学毛泽东思想，始幡然悟前者之非，一切须从头学起。年力就衰，时感不及，为可恨耳。”这就是他解放初期对自己史学研究的总结。

解放后，他说他不忙于作研究论文，主要应当是政治补课。旧社会人称他是史学大师，他说：“我不愿作旧社会的史学大师，我愿作马列主义历史研究的小学生”。他常说：“只可惜我闻道太晚了”。

他的一生辛勤劳动写下了近二百篇专著和论文。为我国的史学研究增添了光彩。

三、自觉革命，不断进步

陈垣同志生在一百年以前，这一百年正是中国处在大动荡、大变化的历史时期。

他青少年时，中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。四、五岁时中法战争，十四、五岁时中日甲午战争，自幼就目睹帝国主义侵略，清政府割地赔款、丧权辱国。从年轻时他就渴望着有一天中国能独立自主、兴盛富强。这时他心怀救国救民之志，参加了反帝反封建活动，并积极宣传科学、学习科学。

辛亥革命后，他认为帝制已被推翻，国家可能富强起来。后来曾幻想如

把教育办好，也能对振兴国家有补，所以也担任过教育部的职务。不想事与愿违，军阀混战连年，今年直奉之爭，明年直皖之战，国家日益贫弱，百姓日益困苦，因此他不愿参与这种“肮脏的政治”，便毅然辞职，从此采取了一种“不问政治”的政治态度。他并不是不关心政治，他曾在《表微》里说到胡三省的政治态度时说：胡三省虽“与政治绝缘”，“然其注《通鉴》，不能舍政治不谈，且有时陈古证今，谈言微中，颇得风人之旨，知其未尝忘情政治也。”这也就是说的他自己。抗战前，蒋介石请他参加国难会议、庐山会议，他都拒不参加，只专心致力于教学与著述，他自己说这时是采取“苟全性命于乱世，不求闻达于诸侯”的态度。

抗战八年，在日寇铁蹄下生活，痛民族危亡，伤国土沦丧，政治、思想、经济、生活上压力都很大，在言论写作不自由、时刻可能发生危险的恶劣环境里，他闭门著书，用巧妙的手法，避开敌人的监视，以讲历史为名，在课堂上，在论著中，传播抗战必胜信念，告诉同学们作为一个正直的中国人，应该爱民族、爱国家，在沦陷区也要读书、学科学，充实自己，保持祖国固有文化，积蓄力量，以待机报国。八年间，他一刻也没休息过，他在精神异常苦闷，生活非常困难的情况下，以顽强的毅力写出专著七本，短文多篇，每年还都担任教课，并指导研究生。这八年，他时刻关心着国家的兴亡，民族的安危，做着有利于反帝爱国的工作。

抗战胜利了，他欣喜若狂，欢喜得流出热泪。但转眼间国民党接收大员飞来北京，美军趾高气扬地横行街市，国民党反动派横征暴敛，他日夜盼望着的祖国回来的人员，却是这样巧取豪夺，爭权夺利，使他这位耐心等待了八年的老人，大失所望。他看到三年间国民党的所作所为，逐渐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，他思想上感到苦闷，政治上感到徬徨，但他一时还没找到真正出路。

北平解放前夕，解放军兵临城下，蒋介石三次派飞机来接他，这时他对国民党早已不抱任何希望，他决心不走，决定留在北平，要亲自迎接解放。

一九四九年一月解放军进城时，他心情异常激动，这天他和两个学生自辅仁大学步行到西直门大街，站在马路旁欢迎解放军。一年后，他在一次会上谈到北平解放时说：“北京解放，这是一次翻天覆地的变革，这时才把我从梦中唤醒”。他说他初次看到了纪律严明的军队，勤劳朴实的干部，一切为人民利益着想的政党，他感到惊奇，感到佩服，几十年，他历尽沧桑，经过多少次兴亡盛衰，所有的当政者都是置民水火，吸民脂膏的。他说：“这时我才逐渐认识到，多少年我梦寐以求的，多年来所向往的祖国独立富强的道路，就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道路。”

解放后，他认识到自己大大落后于时代，决心奋起直追。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，每天用放大镜认真阅读、钻研。同时积极地参加了政治活动。